

# 疫情危机中的社会韧性建构与 社会工作定位

邓 锁

**摘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社会治理的重大考验,也促使社会工作界更深入思考自身的专业角色与未来发展。基于社会韧性的相关视角并结合此次疫情危机,本研究指出,社会工作能够通过推动应急管理的跨专业协作、促进脆弱人群的需求回应以及提升社会信任关系而在社会韧性建构中发挥其专业优势。同时,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社会工作还需要在功能、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更加明晰自身的专业空间与发展定位,这包括强化社会工作应对社会风险的整体性视角、在风险治理体系中纳入制度化的专业角色以及提升风险情境下的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等。

**关键词:**社会韧性 社会工作 风险社会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20)02-062-08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20.02.009

邓锁,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 一、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不仅造成了人员生命的损失,也对生产生活秩序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带来巨大冲击,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及社会治理所面临的一次重大考验。应对此次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的防控总体战、阻击战,全国上下各部门积极响应、迅速动员。社会工作者秉持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专业使命与情怀,也广泛地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在疫情中心的湖北省及其省会武汉市,一些社会工作机构通过“线上+线下”服务方式的创新,在信息支持、心理疏导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随后,2020年3月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的通知》,进一步指出要将心理援助和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疫情防控的整体部署。政府对于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视和期望让社会工作界为之鼓舞,也促使社会工作界更多地思考重大疫情事件中的专业责任、角色与能力。

新冠病毒疫情是全球社会所面对的共同挑战,疫情的爆发也再一次警醒人类在高度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必须正视日益增长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德国社会学家贝克(Beck,2004)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当代社会风险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全球性与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特征,这使得已有风险管控的制度有效性受到挑战。作为后发展国家,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既有可能产生局部领域的重大风险,也有可能产生全局性的社会风险,迫切需要加强对于风险的预判以及强化风险治理体系。从系统视角来看,风险的不可预测性要求系统是复杂的、开放的,能够容纳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并同时具有受到外部干扰而能够适应和再生的力量。社会系统的这种复杂适应性也可以被概括为“社会韧性”,它是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在遭遇破坏性力量仍然能够维持社会整合、促进社会有效运行的重要特质(王思斌,2016)。社会工作是全社会协作参与、共同应对疫情灾害的重要跨专业力量,而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尤其体现在其对于激发、培育疫情危机中社会韧性的独特意义上。本文尝试从社会韧性的概念、内涵及其与重大疫情等社会风险的关系入手,分析疫情危机事件中社会韧性的建构特征及社会工作的专业角色,并进一步拓展讨论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工作的专业空间与发展定位。

## 二、疫情危机与社会韧性

### (一)疫情危机的社会治理考验

重大疫情危机事件中,公共卫生问题超越了特定的医疗领域,对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

疫情危机冲击着常态治理的运行模式。在病毒传染源及传播方式尚未能完全确定,有效的预防和治疗药物尚不可得的情形下,风险从公共卫生子系统向社会更大的系统层面蔓延,对治理的层级与治理效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突发重大事件使常规组织运行机制受到严重干扰,尤其在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确诊感染数量上升很快,医疗物资急缺,为了与病毒蔓延抢时间而迅速出台并实施的应急管控措施,造成了部分地区和机构在执行上的混乱失序。疫情危机导致常规工作机制的延宕、已有管理经验的失效,在救治病患的紧迫时间—空间压力下,常常出现预案不充分、协调分工不足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更加灵活多元、跨越科层层级和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提升应急决策能力。此次疫情危机显示,我国已有的治理结构与日益增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适配性仍不足,特别需要强化预防、应对和控制风险的治理意识与治理模式。

另一方面,疫情危机还会影响到社会心态与关系结构,可能带来社会排斥与分化的后果,是社会治理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严格的防控隔离措施下,受到疫情直接影响的一线工作者、感染者、丧亲者乃至普通的民众,都会经历程度不同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对于突然丧亲的个体来说,哀伤情绪在疫情中无法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得到纾解,可能在较长时期产生愧疚、自责以及自我封闭等的心理创伤问题。疾病传染本身具有污名化的效应,各类防控措施还可能加剧对受到感染者或风险感染者的社会歧视与排斥。疫情应对中,许多地区实行严格的“内防输入、外防输出”封闭隔离举措,一些地方封路断行、粗暴执法,将武汉、湖北乃至外地人都列为防范对象,不仅侵犯了民众的正当权益,也使得一些担心被排斥的民众刻意隐瞒自己的外出经历,反而不利于疫情防控。一些不当的防控举措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恐鄂”氛围,对社会信任造成了损害。随着疫情形势的向好,一些个人或家庭的心理压力可能逐渐地缓解,但受感染者及其家人的心理创伤、病愈者的社会融入等即使在疫情结束后也仍然

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问题。可以说,疫情的危机也带来整个社会心理的应激危机,需要从社会治理层面及时地进行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

## (二)社会韧性及其建构的意义

社会韧性对于疫情危机的应对及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是支撑社会系统良好运行的基础。韧性也翻译成为“抗逆力”或者“复原力”,在工程学意义上,韧性指材料虽然受到冲击发生形变,但不易折断破裂并恢复原状的特性,与刚性和脆性相对(Holling, 1996)。发展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工作借鉴了这一“回弹”(bounce back)的涵义,但较多地将其运用于个体和家庭层面,韧性被视为服务对象在逆境中仍能积极面对和适应的特质,是风险因素与个体应对风险能力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Werner & Smith, 1982)。生态学、灾害研究则更多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分析韧性的特征及其来源,社会韧性被看作是灾害发生后,社会系统或个体适应、响应以及快速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它既包括系统能够吸收灾害所造成破坏性的内在条件,也包括系统自身恢复、适应及实现转化的可能性(Holling, 1973; Adger, 2000)。社会学视角更加强调社会系统中的关系性特征,如王思斌(2016)将社会韧性理解为社会的结构性、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性,它包括了社会关系、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等具有经验性和稳定性的特质。从社会连接性的意义上看,社会韧性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两类关系结构层次,前者是指正式的组织运行体系,如不同的组织、部门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网络,后者指非正式的社会纽带关系,如生活共同体中的相互信任、扶持及社会凝聚力。韧性越好,意味着不同层次关系结构发生断裂的可能性就越小,也能够激发产生应对外部冲击的更大力量。当然,这里的区分是为了分析上的便利,作为一个跨学科使用的概念,不同学科视角对于社会韧性的理解也都仍然存在着差异。本世纪以来,社会韧性概念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心理学、自然生态学与灾害研究等领域,还日益广泛地应用并指导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代社会运行面临着的更大风险有关(Shimizu & Clark, 2019)。

社会韧性的生成具有自发性,但更需要积极地引导和培育,这反映了社会韧性的内源性与建构性的特征。既有的经济、制度和传统文化等资源是社会韧性得以生发的内源性力量,在突发事件中,这种内在的力量会发挥抵御冲击的保护性作用。好比人体在病毒侵入时会自发产生免疫和抗体,个体、家庭和社区在面临困境时也会产生抵御困难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韧性。个体层面的心理韧性体现在面对困难战胜逆境的信念和积极行动,社会层面的韧性体现于在突发危机事件后所产生的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社会凝聚力。不过,社会韧性的激发并非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它受到外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也有赖于社会系统中的行动主体能否积极主动地应对风险,及时有效地调整、建构自身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王思斌, 2020a)。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韧性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是在风险压力下不断地获得持续性、适应性和转化性能力的动态变迁过程(Pelling & Manuel-Navarrete, 2011)。

新冠疫情是人类现代社会所经历的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病毒本身的未知性以及所带来的全球经济社会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疫情发生后,特别是严格的“封城”措施实施之初,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应激反应状态,民众迫切希望得到公开真实的信息,希望看到混乱秩序尽快得以恢复,期待政府更强有力的应急管理举措及效果。政府则因应疫情蔓延的程度不断地调整应对方案,从早期部分地区和工作人员的轻忽失职,到逐渐建立起更加有序、有力的疫情防控管理机制,层层推进、层层深入,使得国内疫情蔓延形势得以尽快遏制和扭转。与此同时,疫情中心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每日不断攀升的感染病例、一线医护人员的安危和社区工作者的重压也无时不刻不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无论是

受感染者战胜病毒的顽强斗志,还是医务人员、基层工作者及志愿者不顾安危、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都体现出重大疫情事件发生后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抵御危机的韧性力量。疫情危机可以被看作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压力测试,不仅考验政府的疾病控制体系、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以及整体应变机制和能力,也考验社会的向心力与互信程度,社会系统能否培育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险治理的有效性。社会韧性影响到系统从灾害复原的可能性及其程度,而持续、有意识地激发和培育社会韧性,对于疫情防控以及疫情消退后的生产、生活重建都至关重要。

### 三、社会韧性建构与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疫情危机下的社会韧性建构需要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协作参与。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科学的助人专业,通过引导、培育社会韧性在突发危机事件的应对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由社会工作作为人类服务专业的优势及其实践特点所决定的。

在疫情防控中,社会韧性首先体现于应急管理行动体系的跨专业协调性与灵活性,社会工作的参与有利于突破传统的系统边界,促进这一体系及时有效地回应疫情影响下的社会服务需求。重大疫情的应对不仅是卫生部门的问题,也因疫情所带来的次生影响而涉及到国家治理的不同层次。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各国以“全社会”参与的方式来应对疫情,要求各个政府与社会部门广泛行动,以跨专业、协同全面的方式共同参与疫情防控。处置风险需要一种全局观与协作精神,贝克(2004:84)曾经指出,风险超越了传统的劳动分工,而呈现出一种跨时空的统摄关联性,“它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境界,跨越了各种专业职权和制度责任……并且跨越了似乎是由制度区分开的政治、公共空间、科学和经济的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于专业训练优势的分工不重要,而是说在重大危机事件中,对于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对需要更加综合地考虑技术、经济、组织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要求突破由于传统制度和专业分工所带来的不同子系统领域的分割,使得风险治理体系更具灵活性与弹性。

社会工作所强调的系统视角在应对危机事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中,将个体、家庭与社会看作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整体。然而这种系统视角并非是“大而无当”的,系统中“人的需求”始终是社会工作服务的中心。这种系统思维也影响到社会工作的具体工作方法。在疫情爆发时,社会工作者基于病患及一线医务工作者的需求,积极地链接各种医疗物资、信息和志愿者等资源,对于及时回应危机时刻的服务需求起到积极作用。在重大危机时,基于组织与专业分工的常规应对措施可能不再有效,这需要打破系统、组织部门乃至不同专业之间的边界,加强跨组织协调沟通,社会工作的这种系统思维十分有价值。疫情危机可能带来部门分工协作的盲区,老人、儿童、残疾人等脆弱人群的日常生活困难如果应对不当可能演变成为家庭的灾难,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不同部门和专业之间的通力合作至关重要,而信息化时代便捷的在线沟通技术应用也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跨时空、跨领域的合作可能性及其效率。在跨专业行动中,社会工作者的贡献并不局限于狭隘传统专业分工,而体现在其基于人的复杂性、差异化需求——特别是困难人群的需求,力图克服部门和专业之间的割裂所进行的服务连接行动。这种跨越边界的系统思维,体现了疫情危机时社会工作在促进应急管理体系结构韧性的专业优势。美国芝加哥大学安德鲁·阿伯特也因此将社会工作看作是跨越系统边界的职业,是“边界的行动者”(Abbott, 1995)。

其次,疫情危机中,社会韧性的建构还体现在对受疫情影响之脆弱人群处境的关注与需求的直接回应。社会工作强调公正性和发展性的核心价值,通过直接的服务提供、服务递送体系的改进以及社会政策的倡导落实等发挥其积极作用。公正性在服务传递中体现在资源分配平衡与“需求的正义”。

这涉及到服务对象不同的需求之间如何排序,不同群体之间的需求如何平衡,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来有效回应需求等方面。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原本处于社会脆弱境地的人群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如疫情防控对于低收入群体的生计、独居老人的照顾、监护困境儿童的保护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及时出台有利民生的政策措施不仅有利于缓解经济压力,也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心理影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如疫情中国国家卫健委、人社部和民政部等部门及时出台意见,要求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和城乡社区工作者的关心关爱措施。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也出台对于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强对于受疫情影响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人员的生活保障和基本照料服务。同时,民政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也先后印发关于做好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的救助保护部署安排。不过,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在落实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得更加细致周全,社会工作理念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更好地识别脆弱人群复杂化、差异化的需求,实现福利服务传递的精准有效。此次疫情防控还可能加大部分地区贫困人群的脱贫难度或返贫风险,发展性的社会工作服务不仅强调基本生活保障,还致力于通过多样化的生计重建、能力提升使得脆弱人群更好地应对和管理风险。社会韧性体现于整个社会的包容性,这是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于受到疫情风险影响的脆弱人群的关怀和扶持不仅能够直接地预防和减少“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整个社会携力度过危机的重要基础。

最后,疫情危机下的社会韧性还来自于生活共同体中社会成员之间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的社会信任关系。尽管信息化社会已经极大改变了沟通的媒介和方式,但普通民众对于疫情影响最为直接的感受还是来自于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在疫情防控隔离期间,基层社区的联防联控措施对居民基本的生活出行带来巨大影响,社区基层工作者在人手急缺、防护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承担了大量的防控管理和上门服务工作,迫切需要社区居民的理解与信任。但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还需要敏感于疫情防控之下居民生活、心理、家庭及人际关系等的多样化需求与困境。疫情期间,民众对于病毒感染的恐惧,在某种程度甚至更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对于染病后所可能受到的社会排斥和孤立的恐惧。人们也担心隔离防控对自己家人照顾的影响,对于因为无法照顾家人而感到害怕和无助。疫情导致的社会排斥还可能源于信息获得的不完整或错误,如媒体报道,在某地从武汉返家过年的村民孩子发烧,虽然医生检查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只是普通感冒,但由于没有及时地向社区居民通报确切信息,遭到村民的驱赶,并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社区工作在危机时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支持与协助。在武汉和湖北一些地区,社会工作机构将线上服务下沉延伸,与线下社区工作者保持密切合作,通过对居民提供及时的信息支持、心理疏导和转介服务等助力于社区整体的防控工作,取得积极的成效。

疫情防控中还应当特别注意社区内生支持系统的发育。我国城市社区类型复杂多样,一些社区中的组织化力量如业委会、志愿者队伍等发挥着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积极功能,社区内生的这种支持性力量在疫情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是十分重要的。社区工作方法对于激发社区内在信任支持体系有积极作用,社区通过宣传动员、引导合作参与,能够较好地缓解社区的恐慌心理,以及消除对于受感染者的歧视。同时,社区内生性支持也有利于及时地发现、帮扶特殊群体和困难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通过与社区整体防控工作衔接配合,也能够较大程度上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病毒防控实际上体现了个体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也需要政府与民众有高度互信,这其中既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细致有效的信息指导,也包括民众个人积极的行动参与,如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细致周全的服务提供、居民之间的相互扶持如同社会良好运行的毛细血管,是促发和形成社会韧性、共同抵御疫情灾害的基石。

#### 四、社会韧性建构与社会工作发展定位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失序的严峻威胁,可以说是全球风险社会转型的一个明显表征。社会工作具有应对社会危机的责任与使命,并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疫情危机也引发对于专业发展的更深入反思,社会工作专业应正视日益增长的全球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需要新的历史变迁进程中寻求更加适当的发展定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深化转型时期,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交错并存,应对风险社会挑战的关键在于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笔者认为,在风险社会条件下,社会工作专业能够通过激发和培育社会韧性在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也同时需要从功能、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进一步明晰自身的专业空间与发展定位。

在功能定位上,应更加重视社会工作的整体性视角,强化其应对风险和脆弱性的专业功能。突发危机事件如流行病、金融风险 and 自然灾害等,常常从特定的子系统领域弥散影响到经济社会系统的不同层面,社会工作的参与应致力于通过有效识别、回应脆弱人群的需求而加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预防应对。社会工作的起源发展与回应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解组问题息息相关,早期社会工作者运用人类生态学方法寻求改善受到工业化影响的贫困者处境,开启社会工作关注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整体性视角。然而,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西方福利制度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福利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工作逐渐走向较为狭隘的专业主义。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倾向于“矫正”穷人的认知和行为,对于新的社会风险、贫困及不平等相关的结构性议题则缺乏足够的回应,一些研究者也对此提出批判和反思(Specht & Courtney, 1995)。我国当前处于“时空压缩”的现代性发展阶段,不同领域和层次的风险具有复杂的关联性(景天魁, 2015),突发事件往往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的冲击,加剧脆弱性以及不平等的消极后果。社会工作服务只有同时回应服务对象的个体性需求与其脆弱性的结构处境,才能够更好地提升服务对象的能力以及实现有效的问题解决。在突发疫情事件中,社会工作可能需要在危机应对的不同环节发挥作用,当然不同阶段中社会工作所承担的责任和角色是不一样的。受到疫情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较多的民众尤其是脆弱人群面临着生活困境与压力,社会福利服务在此时被寄予更大的期望。社会工作在疫情危机中的参与因而应当是全周期的,既包括对脆弱人群的物质、心理援助以及协助社区工作等,也包括对社会治理以及福利政策的完善进行倡导及研究,从而促进整体社会系统从危机中尽快复原并得以良好运行。在风险社会时代,社会工作需要从传统的维持性和补救性功能向预防性和变迁性的功能转型,从社会政策与服务传递的下游转向社会政策及社会服务体系的全过程,具备系统性思维和超前性思维(王思斌, 2020b)。

在制度定位上,需要在风险治理体系中纳入社会工作的制度化角色,将社会韧性建构作为风险治理的重要目标。风险治理是一个复杂与广泛的范畴,包括了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等不同的领域和维度。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更多地基于一种线性的、行政化和程序化的专业分工模式,然而在应对突发危机事件中,脆弱人群的需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常常是高度变化性的,如困境儿童、老人等在防控隔离下的生活需求如果不能获得及时回应,可能带来悲剧性的后果。风险治理体系因而应当自下而上地吸纳民生需求的不确定性,并形成较为制度性的安排。基于此次疫情应对的经验教训,许多学者也提出,应当赋予社会工作在应急管理体系中应有的法律地位,将社会工作专业纳入到国家整体的应急管理体制的设置中,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李迎生, 2020)。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还应当强化“三社联动”机制,通过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运用而弥补高度行政化防控工作可能出现的盲点。此外,在疫情中后期较长时间,武汉和湖北等地区还有迫切的社会心理重建需求,这需要尽快确立以社会工作等专业为主体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形成跨专业的服务力量,发挥预防

和应对社会心理危机的合力。此次疫情危机的应对经验也表明,社会工作专业应当整合到整体性的风险治理体系中,其发挥作用的合法性需要获得更加制度化的支持。

在实践定位上,应当加强创新应对风险与脆弱性的社会工作实践知识体系,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能力。疫情危机反映出社会工作的传统实践方法和领域还需要更进一步创新拓展,尤其应着力于更好地预防应对突发性和暂时性的个体、家庭与社区脆弱状况。脆弱性是社会韧性的反面特征。危机事件发生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不利境地的个体与家庭更有可能陷入困境,这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敏感于对服务对象风险处境的识别。专业服务有必要从常规性的问题需求为主的评估,转向以风险和脆弱性为主的评估,包括纳入就业、收入与资产、家庭照顾及社会支持等不同维度的风险与脆弱性评测。在此次疫情应对中社会工作已经并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笔者在与参与其中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交流中也发现,许多实践方法也还有待更新与进步,尤其需要发展出能够有效应对当代社会突发危机事件的介入方法和服务体系,包括如对于危机干预的阶段性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更多知识掌握、突发事件下的志愿者管理、不同层次社会资源的有效对接、线上社会服务的传递方式和成效评估等等。在危机事件时,常规化的专业程序和方法不一定是有效的,还需要建立适应危机情境的快速评估与介入方案。可见,此次疫情危机也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一次大考,迫切需要社会工作提升实践中的反思与研究能力。

## 五、结 语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原有的社会治理方式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和方向。此次疫情应对体现出中国特有的“全政府”治理特征,而在疫情防控进程中不断出台的督查、纠偏、纾困等各类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危机情境下治理体系因应系统内外部风险变迁状况,不断地优化改进自身运行机制的过程。从系统层面上看,社会韧性的建构不仅有助于疫情危机下社会系统的快速复原,也促使系统在危机中更加积极地进行适应、反思及转化。习近平在2020年2月23日的讲话中也指出,这次的疫情应对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而及时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将有助于社会系统在更高水平上的适应性转化。在社会韧性的建构上,还应当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跨部门、跨专业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待遇保障和专业化水平,以及加强社区层面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体系整合等等问题,以期未来能够真正地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前、成灾之前。

在风险社会中,社会系统的运行将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不确定性、变迁乃至危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更好地适应风险社会的特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包括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在内的全国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在笔者成文之时,疫情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仍在肆虐,我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之间还面临着统筹推进的矛盾,当前的公共卫生防御及经济社会发展都还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和培育社会韧性是应对危机和挑战的强大动力。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使其能够成为个体与社会韧性的“促能者”,社会工作也应在社会韧性建构的系统视角下更深入思考专业实践空间与发展路径。

### [参考文献]

景天魁,2015,《时空压缩与中国社会建设》,《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李迎生, 2020, 《发挥社会工作在疫情防控中的专业优势》, 《光明日报》3月6日。
- 王思斌, 2016, 《社会韧性与经济韧性的关系及建构》, 《探索与争鸣》第3期。
- 2020a, 《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2020b,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深入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 《中国社会报》2月28日。
- 乌尔里希·贝克, 2004,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Abbott, A. 1995, “Boundaries of Social Work or Social Work of Boundaries?.” *Social Service Review*, 69.
- Adger, W. N. 2000,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They Relate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3).
- Holling, Crawford S. 1973,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4.
- 1996, “Engineering Resilience versus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Engineering within Ecological Constraints*, edited by Peter C. Schulze, 33 - 43.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PellinG, M. & Manuel-Navarrete, D. 2011, “From Resilience to Transformation: The Adaptive Cycle in Two Mexican Urban Centers”. *Ecology and Society* 16 (2).
- Shimizu, M., & Clark, A. L. 2019, *Nexus of Resilie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a Modern Risk Society*. Singapore: Springer.
- Specht, H., & Courtney, M. E. 1995,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Werner E.E. & Smith R.S. 1982, *Vulnerable but Invincible: A Study of Resilient Children*. McGraw-Hill, New York, NY.

编辑/程澈

## 《社会工作》杂志郑重声明

近日,接到举报,不法分子伪造本刊编辑身份,声称“有绿色通道可以加急审理”稿件,且以发表为由,非法收取费用。此举严重损害了本刊的声誉。由此,作出如下郑重声明:

一、《社会工作》杂志从未设置“中介”等编辑身份,目前未开通杂志网站,进行征稿事宜。也未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代为开展征稿、组稿、快速审稿等服务。凡此等行为,皆为假冒。

本刊的投稿邮箱、联系电话等信息,以纸质刊物、微信公众号的公布为准。投稿邮箱 socialwork2013@163.com, 微信公众号为 socialwork2013, 电话号码:0791-86252487。

二、《社会工作》杂志“以质论稿”,发稿不收取任何费用,凡向作者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不论多少,不论何种名目,皆为假冒。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辨别,避免上当。

三、对于伪造本刊网页、邮箱,盗用本刊刊名、刊号和稿件资源的非法行为,本刊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社会工作》编辑部



**(5) The Grief Control of the Bereaved in COVID-19 an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XU Xiaojun TANG Susu YUAN Qiuju • 53 •

Grief for the death of the COVID-19 has experienced a special evolution process due to the lack of life farewell, death threats and stigma, mass grief reaction and other factors. First, part of the "lost response" precedes the bereavement event; in the "shock and escape" stage, the difficulty of reality also forces the sharp pain of grieving period to be postponed. In the "face and collapse" stage, the loss-oriented grief work is the only way which must be passed for the bereaved, and the risk of suffering from prolonged grieving disorder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creases.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the bereaved to enter the "acceptance and reorganization" stage smoothly, while they may also be involved in the disorder of movement-oriented grief work. In view of the specificity of grief caused by COVID-19,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taken in stages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possible individual and social risks caused by the bereavement. The social work should be guided by a timely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 to guide the bereaved family to moderate their grief and gradually accept the fact of bereavement, thus smoothly transferring to the swinging-oriented grief pattern and finally realizing th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lf-life.

**(6) Social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in the Epidemic Crisis and Social Work Positioning**

DENG Suo • 62 •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s a major tes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 has also propelled the social work community to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its own professional rol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silienc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crisis,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social work has its professional advantage in stimulating and fostering social resilience through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enhancing social trust relationships.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social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social work community needs to be clearer about its professional sphere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t three levels including function, system and practice. This includes highlighting the holistic approach of coping with and managing social risks, incorporating social work into the institutionalized risk governance system, as well as promo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in the context of risk society.

**(7) O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LI Qingl CHEN Cheng-wen WANG Yong • 70 •

Social work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mean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has its own unique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promote the pilot 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we must enhance the possibility of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pilot 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o enhance the possibility of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pilot 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the city, the most fundamental thing is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system construction is a key link for social work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This is because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will not only help to enhance the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work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but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ocial work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ystem innovation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ity, we must strive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purchasing public services; strive to establish the identity system of social work institutions; strive to 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capacity building system of social work; strive to establish the social recognition system of social work.